



提要： 朱德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终生为党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科学精神、团结意识、革命纪律、艰苦奋斗与勤俭节约等六个方面的教育。朱德认为，要增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实效性，就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了解和关心教育对象；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和风细雨，以理服人；注重发挥“典型”的作用。

关键词： 朱德；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理论；主要内容；实效性

朱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朱德以身作则，带头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并对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实效性等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理论。

一、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要在“六个方面”下工夫

朱德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终生为党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科学精神、团结意识、革命纪律、艰苦奋斗与勤俭节约等六个方面的教育。

1、要亡国没种了，就是牺牲身家生命，也要去救国家……[1]

热爱祖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人民最高的神圣追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爱国主义作为动员和鼓舞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朱德崇尚爱国主义思想，强调爱国主义的重要性。他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共产党诞生。一心追求真理的朱德，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他在自己家里组织了泸州第一个学习小组。“喜当年富兼身壮，时正秋高又马肥。戎马少年半同学，倾心为国志无违。”[3]表现了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朱德，藐视敌人，忧国忧民，追求真理和光明的思想。在这一时期，朱德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的入门书《共产主义ABC》等，细读党的理论刊物《向导》，联系实际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解剖自己的过去，特别是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多年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他从多方面的反复比较和思考中认识到，要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除了信仰马克思主义，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之外，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于是，他毅然抛弃了高官厚禄，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朱德积极投身德国工人运

运动和旅欧留学生的革命实践活动,远涉重洋,追求真理,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终于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坚定地树立了“终身为党服务”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从此,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了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一个革命家有革命家的人格,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具有共产主义品质,朱德真正身体力行,并使其内部思想与外部行为高度一致。

2、一个总的原则,即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4]

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牢固树立、努力践行“以服务人民为荣”的价值观,要求我们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真正做到民为先、民为本,始终保持与人民的血肉关系。朱德坚持“为人民服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观点体现朱德关于党的领导阶层应是如何正确对待人民群众。他认为,我军是人民的公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军的“一个总的原则,即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5]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我军的一个根本观点,也是我军的唯一宗旨。我军既然是党和人民的公仆,因此我们必须把向人民群众负责作为自己言论行动的准则。朱德还认为,我党必须加强群众监督,各项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首先,军事教育要走群众路线;其次,战术运用要走群众路线;第三,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第四,实行奖励也要走群众路线。如果我们在部队中工作的同志不断加强群众观点,遇事走群众路线,同群众打成一片,吃饭在一块,行军在一块,做到思想一致,行动一致,那我们就能把部队带好,带成一支模范的队伍。建国后,他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我们的党只有在受到广大群众拥护和监督的条件下,才是强有力的。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和阻力,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6]在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朱德是最长寿的一位,享年90岁。这一点说明什么呢?说明朱德真正做到了“心底无私天地宽”“处世从容日月长”。

第二,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朱德认为人民群众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党与人民是鱼与水的关系,因此,领导者必须发扬民主,尊重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早在1950年3月朱德就觉察到党内存在党政不分现象,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指出,只要领导人肯征求群众意见,民主讨论,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从省委到支部,工作就会好做。接着,他再次主张党政分开,要在保证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的同时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应在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上而下的批评。”而应该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改正错误,这本身就是向人民群众负责。“领导工作发生了错误,只要上面肯作自我批评,下面怨气就容易消。”要求领导必须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把有不同意见的问题先搞清楚,有错误的来个自我批评”,如果“自己犯了错误,怕人家揭穿,就压制群众,哪个还敢讲话呀?反之,下面见你作了自我批评,他就也作自我批评”。因此,“有了错误不要怕,不要掩盖起来。”[7]

3、依靠技术建设国家[8]

科学是人类最重要的文明成果,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朱德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坚持依靠技术建设军队和国家

朱德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我们的军队一定要下决心用尖端技术武装自己。如果我们的军队能在思想政治上武装好,再加上先进的装备,那就会成为天下无敌的军队,这样就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不敢侵略我们。”[9] 1949年11月8日朱德在水利工作联席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依靠技术建设国家”的观点,详细阐述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强调自然科学工作一定要同全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与国防建设密切地结合起来。1956年4月25日,朱德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现在世界正处在工业技术革新中,必须运用世界最新科技成就,提高技术。对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10]在国务院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会议上,他提出要发展尖端武器、搞原子弹和导弹的主张,并得到周恩来的肯定。朱德认为旧中国老是受人欺侮,就是因为落后;争取和平,就要发展技术,如

果我们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就没有人敢欺侮我们了。在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直接关怀和领导下,经过广大科技工作者和解放军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中国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自己设计和制造的原子弹,之后又成功地研制出核导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

4、一切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必须把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一项任务[11]朱德号召人民要团结起来,他认为,团结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党的团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全党的最高利益,每个同志都要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奋斗,作为思想、言论、行动的标准。”[12]“一切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必须把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他号召全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坚强地团结起来”“向一切不利于党的统一和团结的因素作斗争”[13]。“全党、全民必须同心同德,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也就是说,这种团结决不是无原则一团和气的团结,而是要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辨别是非。“共产主义者手中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没有任何的是非不能得到合乎原则的判断。只要大家都提倡服从真理的精神,任何争论都可以有合理的结论,那末,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团结起来的理由呢?”他要求每个党员必须学会和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搞好团结,“我们必须反对在党内关系上任何种类的宗派主义情绪,每个同志都要学会和其他同志团结,特别要学会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团结。因为,对于经常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建立团结的关系并不是困难的,也不是问题的关键;困难和重要的,正是要和那些经常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实行团结。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为了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我们没有任何东西不可以牺牲。”[14]

5、继续在党内坚持铁的纪律,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性,以保证全党的统一与集中,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事情[15]

法制建设思想是朱德同志的荣辱观的主要内容之一。严肃党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的基本条件之一,这是马列主义经典的一个重要观点。马克思曾主张“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16]。列宁曾认为“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其严格的纪律,是它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特别重视加强党的纪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特别强调说:“必须重视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17]朱德也非常重视法制纪律建设。在如何加强党的纪律性方面,朱德提出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必须进一步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够继续坚持铁的纪律、加强党的纪律性,以保证全党的统一与集中的党,并围绕这一基本思想详细地阐述了在党内继续坚持铁的纪律和加强党的纪律性的重要性,“对于那些党曾告诫在先而仍违反政策和纪律以及违犯了纪律仍拒不改正的党员干部,必须给以应有的纪律处分”[18],“如果党内没有纪律或者不坚持执行党内纪律,那我们的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无法率领千百万群众去进行胜利的斗争,取得像今天这样巨大规模的胜利。”为了“更好地克服一切破坏党的路线、政策的行为或倾向,继续在党内坚持铁的纪律,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性,以保证全党的统一与集中,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事情”。

加强法制建设,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强调民主并不是否认原则,丢掉法律,而是要整顿党风,严肃党纪。朱德主持中纪委工作后,提出建立办事机构,制定工作细则,选调党性坚强,忠实可靠,作风正派,具有相当的政治、思想、文化水平,敢于同坏人作斗争的党员干部到纪委工作。朱德兼任中纪委书记,前后共5年零7个月时间,他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为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倾注了许多心血。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这些时间内处理了近30万起案件,

在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克服党内纪律松弛现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曾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王从吾回忆说:“朱德同志以身作则,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纪律,带领大家认真负责地做好纪律检查工作……从而使我们能够从纪律检查方面来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19]朱德把民主和纪律结合起来,使二者如鸟之双翼,车之二轮,共同促进了我国政治文明的进步。

6、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每个革命者所追求的美德[20]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优良传统和重要道德规范,也是朱德荣辱观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勤劳与俭朴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朱德认为每个中国人必须发扬勤劳简朴的传统,他一直推崇和践行辛勤劳动和勤俭节约。朱德勤俭持身,几十年如一日。由于出身贫寒,家庭的影响使他从小勤于劳作,习惯于肩挑背负,跋山涉水。1928年冬,他身为红四军军长,带头从宁冈县的白露挑谷上井冈山,这时,他已是四十出头的人了,挑着担子上山并不为难。第二次反围剿时,部队在南陇地区“待机”,他带领指战员帮助老乡耙田插秧。在著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他身体力行,亲自到南泥湾勘察地形,布置屯田垦荒任务,以前被老百姓称为“烂泥湾”的一片荒山野岭,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野兽成群,硬是被开辟出未来的希望。全国解放以后,他提倡勤俭治国、勤俭治军,时常告诫我们要发扬吃苦耐劳、廉洁朴素的优良作风,他一向反对讲排场、大手大脚的公子哥儿作风,提倡伙食单位养猪种菜,严格经济管理制度。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带头种菜,节衣缩食。他曾经这样写道:“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治国,永久是真言。”[21]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作风。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是须臾不可丢掉的宝贵的道德品质,是“每个革命者所追求的美德”。朱德说:“在过去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所领导的军队以及广大干部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它往往成为决定抗日游击队前途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又反复强调,我国是一个经济技术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很低的国家。为了改变我国这种落后状态,我们将依靠我国全体人民的勤劳和节俭,在原来很落后和贫穷的一个东方大国的土地上建成一个先进和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中,朱德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正处在创立社会主义家业的时期,我们要怎样才能把我们的家业创立起来呢?要靠勤劳,还要靠节俭。……‘克勤克俭,成家立业’的格言,现在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必须时刻牢记和贯彻执行的原则。”1957年他视察成都量具刀具厂时,看到工人在建好的厂房中生产,而厂长、党委书记等干部则在临时用竹木搭成的简陋房屋办公时,大加赞赏,立即向中央汇报,通报全国。朱德还严肃批评了少数党员干部铺张门面、讲究排场,随便挥霍老百姓的金钱的严重现象,指出我们必须动员全党来抵制这种不良的倾向,并具体指出了“在贯彻执行勤俭持家方针的时候,主要应当从勤劳生产、厉行节约和有计划地安排家务开支等三方面来努力”[22]。他特别强调青少年要继承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树立勤俭节约的道德风尚。

二、努力增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实效性

朱德同志不仅全面地阐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且也从原则、方法、途径等方面精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实效性。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对青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朱德教育青年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并认为马列主义是启迪青年的思想武器,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哲学基础。朱德说:“马列主义是反对黑暗与落后,尊重科学与文明的。马列主义的本身,就是科学的最高成果。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是人类五千年科学思想的结晶。以此为

依据,马列主义者借以把握科学的一切部门,而且把握了一个以前一切科学家从来未能把握的科学部门,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科学,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 马列主义乃是一切科学的最高成果,它的世界观,它的方法,当然也适用于一切科学。”[23]朱德认为,青年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就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唯物辩证法,以此作为思想武器,才能使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致迷航。只有学习了马列主义“才能使青年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才能使青年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并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致迷失方向”[24]。朱德把对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同树立青年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其次,朱德提倡科学技术同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49年7月23日,他在中华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者会上讲话指出:今后中国人民的任务,一方面要继续肃清反动派的残余力量,另一方面要用极大的力量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在经济上要把我们的国家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在文化上要从一个文盲遍地、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普及教育、文化发达的新中国。教育工作者要以无限的忠诚与才能来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1950年10月3日,朱德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必须坚持和贯彻教学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这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教学方法,也是培养各种实际建设工作干部所不可缺少的方法。1959年7月,共大建校一周年之际,朱德热情地为共大题词:“坚持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半工半读,又红又专的方针,发扬勤俭建国、勤俭办校、勤俭办垦殖场的精神,开发山区,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朱德还提出要培养一代新人,必须把书本知识同生产实践、科学实验紧密地结合起来[25]。综上所述,朱德不但重视思想道德建设,要求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且崇尚科学并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我们只有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才能从根本上加快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

“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早在1933年,朱德在引用这一名言时就明确指出:“要使实践和理论融合起来。”“学习马列主义,第一个要求,是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事实,认识世界;第二个要求,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把理论运用到实际中来改造实际,从改造实际中更加丰富、发展理论的内容。”[26]“强调学习应由两方面进行:一是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如在战场上、工作中学会本领。但必须提高,把实际斗争的经验总结起来,提高一步,使之条理化。一是理论学习。理论学习和实际中学习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注意或没有理论学习,那末行动就会变成盲目的。理论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如果不掌握理论就会迷失方向。不学习理论是很危险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朱德经常以这句古语勉励自己和教育干部。他说:“马克思主义者是学一辈子也不会够的,做到老就得学到老。”[27]1966年,他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还语重心长地要求全国人大常委都要认真读马、恩、列、斯的30本书。他说:“我现在没有别的事情时就天天读书,今书也读,古书也读。今书就是毛主席的书,古书就是马、恩、列、斯的书。我感到很有兴趣,也劝大家读一读。”

2、了解和关心教育对象

成功的教育者首先要正确认识和了解教育对象,才能做到因材施教。我们人民军队中的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和战士都是青年。朱德作为人民军队的一位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和平建设的岁月,他都乐于与青年接触、交往,深入了解青年干部、战士的情况,同时也通过不同的方式感染、教育他们。因而能够对青年做出了正确的评价。他曾对民主革命时期的青年充分发挥其追求理想、敢想、敢干、不怕牺牲的特点作了极高的评价,同时指出,青年有不成熟的一面,具有较大的可塑性;他们一般有热情,但缺乏坚定的政治方向;有干劲,但缺乏实际生活工作经验;有自由要求,但缺乏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态度;有雄心,但缺乏脚踏实地和艰苦奋斗的勇气……正是由于对青年有正确辨

证的认识,朱德才能对青年教育提出科学、合理的主张。一个成功的教育者一定要关心和理解教育对象。长征时,朱德已近五十,是红军队伍中较年长的人,但他却和战士们一样艰难跋涉,常以自己身体结实为由,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他关心战士的健康,视红军战士为革命最宝贵的财富,在长征的路上,朱德发现一名战士表情十分痛苦,急忙把他扶起来抱在怀里,解下自己的水壶一口口地喂水。还安慰他说:“好同志,你为革命累病了,照顾你是我们应该做的。”[28]关心士兵,官兵平等是我军的优良传统,而这一优良传统的形成正是得益于像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身作则、严以律己的模范带头作用,它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3、身体力行,言传身教

朱德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把“与士卒同甘苦”切实兑现,成为“能身先士卒同甘苦”的名将。他认为干部以身作则、亲自动手是很重要的。“你做什么样子,他就学什么样子……我在井冈山的时候,大家去挑米我也去挑,挑到半山上我就挑不动了,肩膀也压痛了,虽然如此,但是你一挑,他们就抢着挑,一带头事情就好办了。”[29]他还认为,如果军官高于一切,那就是很危险的,并牢记古兵法所说的“将不知兵,以其国与敌也;兵不知将,以其将与敌也”。朱德很注意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在生活方面,他时常穿着朴素的衣服,到城乡里群众中去,访问人民疾苦。他平常生活是朴素的,用餐与部属一样;战时与士卒同甘苦,平时也很注意士兵伙食;在工作方面,他不仅在口头上宣传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还经常深入基层,访问工厂、科研院所,直接和工程师、专家、技术人员接触,进行调查研究,并把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提出建议,作为中央决策的参考;在家庭教育方面,更是如此,朱德曾要求他的独生子朱琦到延安,他认为前线正在打仗,总指挥的儿子首先要上前线,就是这一次,朱琦在通过敌人封锁线的时候,被敌人的机枪打伤了腿,后来留了点残疾。解放后,有一次朱琦和朱德去看戏,戏演完后,因腿有残疾不方便,想和朱德一起坐车,就先上了车。朱德发现后,立即要求他下车,朱琦这才明白过来,马上承认错误,保证以后不再特殊化。

4、和风细雨,以理服人

在解决各种问题时,朱德强调要和风细雨,以理服人。在开展党内斗争时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明确指出:“解决党内问题还是要和风细雨。”在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时,既指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解决党内问题时,对干部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一种坏作风,它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更强调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延安整风找到了解决党内问题的好形式,即“和风细雨,治病救人”的好做法。朱德指出:“我们要靠党的团结,靠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应当治病救人,不能搞惩办主义、无情打击。要很好的爱护干部,尊重党员的权利。如果他们没有经验,就把他们教育好;如果他们有错误,就帮助他们改正。”朱德还强调,要想使党更具有凝聚力,就要提出教育,要以理服人。我们要使每一个党员懂得为什么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并强调如果把个人的名利丢弃,每个党员都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土地革命时期,朱德为了提高士兵的政治觉悟,巩固部队,便给士兵摆事实、讲道理,告诉战士们无产阶级怎样的痛苦、工人农民怎样受压迫受剥削等等,而且还发动觉悟较高的士兵做宣传,这样一来,“不仅指挥员会讲,战斗员也会讲这一套。有些战士,他们讲得非常好。把敌人的士兵俘虏过来马上给他们讲许多的道理,劝他们加入我们的连队。经过劝说、宣传,他们就说‘好,我不走了,就在你们这里。’同志们,你们看,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说服他们不跑了,硬是跟上我们一起打到底。”[30]

5、注重发挥“典型”的作用

朱德认为开展革命英雄主义运动是进行无产阶级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在部队中“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以群众所最注意的和最钦佩的群众英雄及其

业绩来教育群众;以群众英雄的活榜样号召大家前进。”朱德还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应表现为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三个方面的英雄主义,三个方面的模范作用”。在论述革命英雄主义时,朱德把唯物史观、党性和伦理观融为一体,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关于革命英雄主义道德规范的内容。事实上,朱德本人就处处起着模范带头作用,从井冈山斗争开始,朱德就是和毛泽东并称的革命领袖,但他自己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当领袖,而是一直推举毛泽东为领袖。当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他也从不居功。他在1948年5月写的《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中说:“人家把功劳归我,我就把功劳往下推,我想你们也要这样推才好。”他胸怀宽广,勇于做自我批评、极力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从不搞宗派,处处以大局为重。他说:“我们共产党人胸怀要广阔,气量要宏大,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严格一些,有功先归群众,有过勇于担当。”[31]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哺育了千百万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英雄战士。朱德的这种教育方法,对我们今天进行两个文明建设,学习在保卫祖国和现代化建设中的英雄模范事迹,培养人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仍然有重大的意义。

朱德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理论十分丰富,涵盖了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的关系,涉及人生态度、社会风尚等方方面面,集中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统一的治国方略,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党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提供理论来源,是进一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继承和发扬了朱德等老一辈革命领导人的荣辱观,成为构建和谐 society、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调节器,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助动仪。

参考文献:

- [1] [28]朱德风范词典[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1991.
- [2] [4] [5] [6] [7] [11] [13] [14] [15] [16] [18] [20] [22] [23] [24] [27] [29] [30]朱德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 [3]刘学民. 朱德的非常之路[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
- [8] [10] [12] [19]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朱德年谱[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朱德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634.
-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528.
- [21] [31]回忆朱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54.

基金项目:贵州省优秀科技人才省长基金项目:“思想政治工作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

作者简介:

陈成文(1966 -),男,湖南隆回人,贵州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

杨荣华(1978 -),女,湖南隆回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文档附件:

编辑: 文章来源: 《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mail:ios@cass.org.cn

欢迎转载, 敬请注明: 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